

近代中国

【第二十辑】

上海中山学社主办

Jindai Zhongguo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近代中国

Jindai Zhongguo

第二十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 第20辑/上海中山学社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745-773-2

I. ①近… II. ①上…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125 号

近代中国(第二十辑)

编 者: 上海中山学社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773-2/K · 125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孙 中 山 研 究

- 中山先生与上海报界的互动 丁凤麟/1
唐继尧与孙中山的关系略论 邵 雍/8

近代中国政治

- “浙江三忠”与义和团运动 陆玉芹/28
由先进回归保守
——晚清官宦子弟孙宝瑄的经历(1894—1902) 刘 锦/46

近代中国社会

- 近代中国的跨国社团
——以中国扶轮社沪、宁分社为中心 管玉婷/64
国民政府对南京夫子庙地区的改造(1927—1937)
——空间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 刘 炜/96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

- 从“中学”到“国学”
——兼论国学的现代性 陈 绛/114
“魁阁”的重要成员田汝康先生 傅德华 于翠艳/123

近代中国经济

- 近代上海美商经营模式多元化的滥觞 仇华飞 / 131
- 略论 1830 至 1930 年代活跃于香港和上海的
英资银行 李培德 / 146
- 近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建立之困境
——以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为个案考察 易惠莉 / 160
- 清政府与商办企业: 轮船招商局, 1872—1902 黎志刚 / 223
- 江南铁路与近代长三角地区商贸格局的变动 马陵合 / 238
- 辛亥革命时期的泛三角地区近代海关 孙修福 / 261
- 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 陶德臣 / 277
- 民国时期上海华资企业移植西方会计制度问题初探
——以中华煤球公司为探讨中心(1926—1936) 陈计尧 / 304
- 评张謇与穆藕初“实业救国”理念与实践 郭绪印 / 329

史料辑存与研究

- 蒋翊武就义历略 林其铨提供 陈荆残稿 宁纯宜整理 / 361
- 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补证
——兼考姚宏业生年卒日 陈希亮 / 373
- 廉泉年谱初稿 王 宏 / 382
- 关于搜集期刊经济资料的一些初步意见 汪敬虞 / 428

学术动态与出版讯息

- 《张元济全集》编辑纪事 张人凤 / 435
- 《陈懋恒诗文集》前言 卢美松 / 442
- 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年记事》读后 林 刚 / 445
-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重印后记 纪 辛 / 457
-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俄文版在俄再版 李玉贞 / 463

近代重要人物年谱长编出版工程启动	冯 勤 / 476
上海中山学社换届简报	马铭德 / 481
本刊第 11—19 辑目录	483

中山先生与上海报界的互动

丁凤麟

中山先生自从踏上“振兴中华”的革命征途，便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更同报纸，尤其是当年占据中国报业半壁江山的上海诸多平面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图就此作些粗浅剖析，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一)

中山先生成年后，便深知作为大众传媒的近代报刊在改造中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据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记载：早在 1891 年间，孙中山“课余写稿投港、沪各报刊，鼓吹改造中国政治。”^①当他组建革命政党后，于 1899 年秋派其战友陈少白从日本赴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次年 1 月正式面世，成为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具有“立党、宣传、起义”三大功能的第一份革命报纸，坚持了 11 年之久。^②

①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室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4 页。

② 同上书，第 42 页。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先生又与战友在日本筹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并撰写《“民报”发刊词》,明晰阐述了他的新闻思想:“近时杂志之作亦夥矣。姱词以为美,聒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酌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下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①这段对报刊褒贬的立论,颇有破旧立新、振聋发聩的新意。他在揭示当时众多报刊热衷于“姱词以为美,聒听而无所终”,只能导致“自惑”,也就是迷惑视听的同时,更明确阐述了革命报刊作为“舆论之母”的功能,理应通过“斟酌时弊以立言”,成为“缮群”,也就是引导群众“远瞩将来”的舆论工具。在这篇发刊词的末段,中山先生更明确指出《民报》的职责:“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②就是说,革命报刊应通过正确的舆论鼓吹,努力将体现时代精神的革命学说与理想输灌到群众的心中,使之成为群众投身革命变革的内在精神动力。

上述对革命报刊的实践以及对新闻舆论职责与功能的论析,为中山先生日后与新闻媒体的交往与互动,奠定了基石。

(二)

中山先生同上海新闻界的不解之缘,主要是在武昌起义之后缔结的。

当他得知武昌起义的信息,准备从海外返国时,于1911年11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月29日发表《致上海〈民立报〉电》，详细告知自己的返国行程，说冬月初二“可到香港”，此电次日刊发于《民立报》，及时稳定了人心；1911年12月25日刚抵上海，中山先生当天即分别向《民立报》记者和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大陆报》主笔发表谈话，详细介绍了自己“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的梗概以及建国的打算与理想。^①通过新闻纸，及时将筹组中华民国的消息传播到国内外。在沪的数天内，中山先生撰写的信札、函电乃至向各界的谈话和演说，都及时刊发于上海的《民立报》《天铎报》《时报》，尤其是其中《致袁世凯电》《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与江亢虎的谈话》和《复南京各省代表电》等等，都对筹组中华民国起了重要作用。短短几天的密切交往，使中山先生同上海报界结下了深厚情谊。当时，中山先生与上海报界之间，可谓休戚与共，这层关系在他于当年12月31日为上海《民立报》题写的“戮力同心”四个大字中得到集中闪现。^②

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孙大总统发布的政令、通电、演说乃至信札、谈话，等等，大多通过上海多家报纸及时公诸于世。据笔者粗略统计：1912年1月1日至4月1日临时大总统任内，仅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内，收录上海《民立报》刊发孙中山文电达30篇；上海《天铎报》刊发9篇；上海《时报》刊发1篇。此外，王耿雄等编纂的《孙中山集外集》中，还补录在这3个月内，上海《民立报》《申报》《天铎报》与《时报》刊发的中山先生文电、谈话、委任状等达32件之多。这就有力证实，上海平面媒体成为当年《临时政府公报》之外，存录孙大总统执政史料的主要载体。鉴乎此，当年3月1日，中山先生还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给上海《天铎报》“旌义状文”一件，表彰“《天铎报》于中华民国开国之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1页。

② 同上书，第581页。

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应发给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①既是对上海新闻界的表彰,更是激励。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先生对上海报业的生存发展也无比关切。因为当年报纸的经济收入主要依托广告经营,而邮费与电报费又占了开支的大头。武昌起义之后,消息多了,销量大了,邮电费开支大增,而广告收入因战火而大减,一增一减给报业生存带来了危机。为此,上海日报公会特地呈文临时政府,申述并恳请:“军兴以后种种困难情形,请减轻邮电费以维报界。”孙中山于1912年3月17日立即将此呈文批转交通部:“查报纸代表舆论,监督社会,厥功甚巨。此次民国开创,南北统一,尤赖报界同心协力,竭诚赞助。兹据呈称军兴以后困难情形,均属实况,若不设法维持,势将相继歇业。合将原呈发交该部,仰即酌核办理可也。此令。”^②如此明确果断的批文,又以命令下发,充分体现出中山先生对上海报业的高度关爱之情,更为上海报业在民国初年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营基础。

关于这一点,笔者从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盛宣怀档案资料中,便能寻觅到有力佐证。盛宣怀是1893年创办《新闻报》的重要参与者和股东之一。辛亥之前,新闻报经营甚佳,每年约有10%的盈利,也就是白银近万两。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新闻报向股东提供的年度报告揭示:在1911年7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的半年内,新闻报的日销售数增至17000份,但因“市面凋敝”,广告收入大减,该报当年收支反而亏损银洋3986.18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上海报业的关心与支持下,上海报纸新增了十多家,虽然广告收入仍无起色,但由于邮电费得到减轻,新闻报在19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半年内,居然扭亏为盈,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1—152页。

② 同上书,第245页。

上半年收支盈余银洋 121.099 元,至 1912 年下半年,不仅弥补了“旧亏”,还出现了实余银洋 1 217.199 元的奇迹。新闻报在辛亥前后的收支变化,有力说明了正是在中山先生的具体关切下,为上海报业在辛亥时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三)

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中山先生主要以在野之身,继续为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建设真正的中华民国而不懈奋斗。此后的十多年中,他同新闻界,尤其是具有广泛影响的上海报业,关系更为密切,更加荣辱与共、心心相印。

在此期间,他的言论和行止,尤其是重要政见,大多在上海报纸上得到及时报道。值得关注的是,当他刚辞职,立即于 1912 年 4 月 4 日发表《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表示“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①就是说,民国初建,当时的中山先生以为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已基本实现,今后主要为民生主义而奋斗了。4 月 16 日,他在上海参观民立报馆时,陈述自己对报纸的观感:“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之真理屹不为动,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惟知报纸有此等力量,则此后建设,关于政见政论,仍当独抱一真理,出全力以赴之,此所望于社中诸君子者也。”^②这是一段值得珍视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32 页。

② 同上书,第 337 页。

十分精辟的论述,在充分肯定以《民立报》为代表的革命舆论对革命事业的成功作出重大建树的同时,更对报纸及其从业人员寄予厚望,企望报纸舆论坚定不移地坚持真理,用正确的舆论去战胜“淆惑是非”的“不正当之舆论”,“作中流之砥柱”,使革命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才能使人心所向朝着建设中华民国的大目标奋勇前进。这段论述,为新闻界如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基于上述思路,中山先生于1922年9月,又为即将在上海出版的《求是新报》题写了“明辨笃行”四个大字,^①既是勉励,更为新闻媒体如何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切实进行宣传报道,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与期盼。

正是在中山先生对新闻宣传的循循教导、勉励和鞭策下,上海众多报纸对中山先生最后十年的奋斗事业十分关注,彼此配合得十分默契。仅据王耿雄等编纂的《孙中山集外集》刊载:在1915年至1925年间,上海民国日报、新中国报、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等上海报纸,刊发了大量孙中山的函电,其中,仅上海《民国日报》即刊发中山先生电文36件、函稿7件。此外,《孙中山全集》中蒐集的上海报纸所刊发这时期许多件中山文稿尚不计算在内。于此可见一斑。

应该一提的是,集中抒发中山先生新闻观的重要文稿《新闻学大纲序》,就是他1923年11月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伍超《新闻学大纲》一书撰写的。这篇序言,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现状和新闻记者的职责,首先做了明晰阐述:

“新闻事业非易事也,而为新闻记者者,尤非易事。社会之嫉视,个人之劳苦,固无论矣。即事业之难以进行,职务之难以活动,又岂他人所能洞悉哉?今伍君新自美返,以其所学示人,盖亦有感于我国新闻事业之幼稚,思有以补救之耶?夫新闻记者之在欧美

^①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页。

者,所负之职务极重;非惟政治之发动,足以寻其机;学术之进境,足以救其偏;风俗之臻败,足以匡其失;即社会之改革,人心之纠正,亦惟记者是赖。记者乎!尔亦知职权之重要否耶!”^①

这是借“他山之石”对记者的职责之重要性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既是激励,更是鞭策,可谓语重心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山先生在阐明新闻记者“职权之重要”的同时,还结合中国实际,对当年国内的新闻环境以及新闻界的弊端及其根源,作了更为鞭辟入里的剖析:

“吾国今日,外逼于强权之压境,内则因奸邪之横行;国事螭蟾,民生涂炭;只可藉以一叹呻吟者,舍新闻记者外,更属诸谁何?是则我国记者之责任,不又较甚于欧美耶!然国人于新闻事业,素皆漠视;对于记者,尤多目之如蛇蝎。此虽国民未具常识之所致,要皆记者之自为之耳!试观各地之所谓访员者,或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竟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真相暴露,则又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于此,而欲求新闻记载之有价值,不亦南辕北辙乎?究其原,未明新闻事业之本旨而已!”^②

这是一篇多么痛快淋漓而又精深辩证的论析,“立论本于国情,举例由于实践”(中山先生语),在当时国内的新闻论著中很难找出与此比肩的第二篇。这是一篇全面而又深辟反映中山先生新闻观的文字,不但对当时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极具指导性,即便是对早已时过境迁的今天新闻事业的建设与运作,仍有其值得深省与借鉴的现实意义。

(作者丁凤麟,上海《解放日报》高级编辑)

①② 《孙中山集外集》,第653页。

唐继尧与孙中山的关系略论*

邵 雍

唐继尧与孙中山的关系是民国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它的背后涉及南北关系以及南方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关的学术成果主要有谢本书的《唐继尧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刘光顺的《唐继尧评传》收入刘光顺主编的《唐继尧研究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以及陈长河的《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陈长河的论文认为“唐是孙的一贯反对者”,将唐说得一无是处。刘光顺的《唐继尧评传》对唐继尧赞美有加,似有偏爱。谢本书的《唐继尧评传》对唐孙关系的评价比较中肯,但对 1920 年下半年孙中山、唐继尧等四总裁连续发表六次宣言基本没有提及,因此唐继尧与孙中山的这段合作无意间被忽略了。本文以唐继尧与孙中山自己的文本为主要史料,力图对唐孙关系作出比较全面完整的评估,以期加深对民国政治史的认识。

(一)

唐继尧在日留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又

*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SJ0703 研究项目。

于1911年10月参与了云南光复起义的五次密谋,起义时直接率军进攻总督署。胜利后唐继尧担任云南军政府的军政部与参谋部的次长。1912年1月又任云南北伐军司令,后奉命改道入黔,与宪政党联手,大杀自治学社革命派,3月被推举为贵州临时都督。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关于建都南京还是北京之争中,唐继尧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通电说:“窃以燕蓟形势便利,实胜南都,新命旧邦,足资控驭,兼之大局危迫,更无从容坐论之时,神京所宅,可勿再计。”如果定要建都南京,那么“岂惟视眈欲逐,外患相逼而来,瓦解土崩,势且内溃。本求自救,转以速亡。”^①众所周知,民国初年的定都之争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定南定北实际上就是革命党与北洋派的政治抉择的表现形式。由于在定都问题上唐继尧明确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因此被袁世凯正式任命署理贵州都督。在二次革命中唐继尧又支持袁世凯,以贵州已有统一党为由,不准组织同盟会贵州支部。1913年11月唐继尧经蔡锷推荐,就任云南都督。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时期唐继尧先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是投靠袁世凯,站到革命党的对立面上去了。不管怎样,双方尚无直接的来往。

1914年10月27日,唐继尧先后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等人。^②唐继尧曾在督署亲自审问过国民党的一个司令,贵州人。被审者口供的主要内容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起反抗。”审讯结束后立即被枪毙了。^③1915年秋,孙中山派原贵州自治学社领导人、贵州

① 《致南京及各省请捐弃小嫌速决大计共奠北京先定国本电》,《会泽督黔文牍》电报,第2页。

②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10页。

③ 邹若衡《云审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

安抚使蔡济武来云南组织反袁武装,也被唐继尧所捕杀。^①但在全国反袁斗争形势的促进下,唐继尧逐渐转变立场,由拥袁转向反袁。这种积极的转变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增强了护国军的安全感。据记载,早在1915年9月11日,唐继尧就与少数军官开会商议,相约三事:(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这就是护国战争前,滇军军官的第一次秘密会议。^②尽管这次会议的政治态度并不明朗,不过毕竟说明唐继尧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

同年10月,唐继尧秘密派出代表驻沪,并分别致函孙中山、陈其美,明白表露自己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态度,重提自己是同盟会员,欢迎孙中山领导反袁斗争。唐继尧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梟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欲行帝制……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慙,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③在致陈其美的信中,则希望“伏冀推同盟之旧谊,锡以南针,本革命之热诚,助之鼎力。”^④由此看来,在反袁斗争时期,唐继尧先是拥袁后来反袁,并积极设法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这是值得称道的。

(二)

在护法斗争时期,唐继尧在西南各省军阀中打出了公开反对

① 《贵州革命先烈事略·蔡济武条》,《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80—281页。

② 庾恩畅:《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5页。

③ 《唐继尧致孙中山信》(1915年10月),《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16—17页。

④ 同上书,第17页。

段祺瑞内阁的第一炮。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的同一天,唐继尧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电报说:“顷接芝泉支电,有奉总统命令于本日就总理职等语。又急电谓,大局即可解决,各省军队非奉副总统及本总理命令,不得擅离原驻地,并不得另立名目添募军队等语。言多不经,殊堪诧异……此次变乱;即段氏酿成,安能再居总理之位!黎总统以非法解散国会,又误引张勋入都以致复辟,业已违法失职,且在孑然一身颠沛流离之际,下命令以任总理,在法理上尤难认其有效。乃芝泉复欲钳制各省,不许动兵讨逆,殊属百思莫解。非故纵元凶,即图居功首。继尧誓不承认!”^①这一炮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与赞赏。在此前后,唐继尧多次公开表示了反段的意图。

当时滇军深陷四川内战之中,滇黔军在与受段祺瑞支持的川军作战中失利。唐继尧为了报复和扩张,准备力争四川,称霸西南。8月11日唐继尧宣布“护法”,但另行打出“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军”六个军,自任总司令,准备大举入川。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说:“继尧靖国护法,夙有同心,载造元黄,此物此志。今政局蹉跎,川乱尤亟,不先戡定,祸弥全国。矧滇蜀比邻,势切唇齿,一发而动,全身膏腴。观火隔岸,决不忍为。披发纓冠,在所必救。居今之计,惟有一意恤邻,建设问题不得不暂时抑置。”^②唐继尧又批示将这一电报登报发表。

9月初,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但唐继尧复电孙中山拒绝就任,称:“元帅一职,虽忝国会推举,自维才望无似,不欲冒君子上人之戒,又惧蒙世俗权利之嫌。”^③孙中山复电解释说:“议员在粤开会,于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2页。

② 《复广东孙中山电》,《会泽靖国文牍》,卷二,第8页。

③ 《唐继尧辞元帅致孙中山密电》,《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43页。